

书 品

(2008年第5辑)

徐俊 主编

中华书局

序跋录

- 李学勤 《甲骨集史》序 3
- 袁行霈 《徐陵集校笺》序 5
- 邢义田 “秦汉史论著系列”四种自序 6
- 渡边信一郎 《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译本自序 16

学林往事

- 姜庆刚 李小缘先生书信续辑 24

评书论学

- 赵 诚 读新版《说文解字注》 32
- 齐元涛 易敏 重读《基础汉字形义释源》 35
- 仇鹿鸣 通人之学 史家之识
——《九品官人法研究》读后 40
- 刘小兵 “他者”的启示
——读《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 44
- 柴剑虹 趣博旨约,识高议平
——《日本中国学述闻》读后 48
- 贾丹丹 开元九年敕与唐代制举对策文策题体制
——《唐代试策考述》指瑕 53
- 陈彝秋 新材料、新成果与新课题

——读《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	62
谢 方 读《吴渔山集笺注》偶得	66
荆世杰 王锋 深度研究中华书局的一部力作	
——《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评介	69
童 岭 介绍铃木虎雄《骈文史序说》新版	73
读书札记	
萍 庵 读史拈字四则	75
王 斌 《老学庵笔记》校读献疑	78
赵承中 《高阳太傅孙文正公年谱》版本献疑	83
商榷篇	
于士倬 《历代宅京记》订误一则	86
甘桂荣 百科全书“静嘉堂文库”条释文商榷	87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 17	
关于《南齐书》初点本的意见致王仲莘先生函	91
书苑撷英	
施和金撰《北齐地理志》 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 章太炎撰	
《国故论衡疏证》 刘熙撰《释名疏证补》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徐 俊 副主编：沈致金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梁 彦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电话：(010)6345823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甲骨集史》序^{*}

● 李学勤

《甲骨集史》是刘桓教授在近二十年期间撰著的第四部甲骨研究的专题论文集。其前三部是1989年的《殷契新释》，1992年的《殷契存稿》和2002年的《甲骨征史》，我都有机会写序，读者也可看我的《拥彗集》、《清路集》，序中已经表达了对刘桓教授辛勤治学、矢志不渝的深切感受。相信《甲骨集史》的读者，一定会同样认识到他的深厚积累以及丰硕成就。

殷墟甲骨的发现与鉴定，时在清末的1899年。最近我屡次说到，这和1799年古埃及罗塞塔石刻的发现，刚巧相隔一百年。罗塞塔石给古埃及文字的解读提供了钥匙，甲骨文的出现也为探讨商代还有更早的历史文化准备了基础，两者都不愧是学术史上有关键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甲骨文刚刚为学术界所知的时候，学者主要是从文字源流的角度估量其珍贵价值的。如最早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孙诒让《契文举例》，其自序云：“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以后。赏鉴家所槩楬为商器者，率臆定不能确信，每憾未获见真商代文字。”及至看到《铁云藏龟》，不禁赞叹“不意衰年睹兹奇迹”。不过他所作考释，已经涉及“官氏”、“方国”、“典礼”等历史内容。到1910年，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即已指出甲骨文“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将考订历史放在第一位了。

1914年，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于甲骨文中发现商先祖王亥

* 中华书局即出。

之名。随后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在探寻古史上取得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到了1925年，王国维先生于清华讲授《古史新证》，通过甲骨文等“地下之新材料”来研究古史的经验提高到“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高度，对后来的古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甲骨本来是一种考古文物遗存，大家知道，不管是考古学，还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都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研究甲骨文，最终目的是认识古代的历史文化。刘桓教授多年的工作，始终坚持这一点，他的大量论作，都是由文字的考释进而讨论历史的重要问题，因此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说，绝不意味贬低考释文字本身的学术意义。实际上，即使是突出强调历史研究理论性的学者，如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字研究》中便曾指出：“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只有正确地释读了文字，才有可能揭示甲骨文所蕴藏的历史，否则不但不能知道古史的真相，反而会对理解古代产生误导的负面作用。

《甲骨集史》所收论文，大多与殷商历史重要问题相关，如《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关于商代贡纳的几个问题》、《试说卜辞的“奠甘侯”与建侯的关系》、《商代祭祀时的仪仗队》等等，都论及商代的制度和礼仪；《关于殷代武丁的辅弼之臣传说的考证》、《舌字构形释义》、《天攸鼎、般甗与征人方之役》、《卜辞所见周文王时期的商周关系》、《关于吕尚的出身及其被举用史事索隐》等等，都讲到商代的史事和人物。关于甲骨文最新发现的，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几处字词释读》、《关于殷墟卜辞中“丁”的问题》等篇；关于学者间争论问题的，有《释甲骨文“𠄎”字》、《关于所谓“亚醜”的“醜”字的释读》等篇。至于在文字释读解义等方面别出新义的，还有好多，这里不能遍举。

当前正是新世纪初期，甲骨研究在经过百年以上众多学者努力之后，正迈入全面深入的发展新阶段，相信刘桓教授会继续前进，取得更多更重要的成果。

2008年7月7日

《徐陵集校笺》序

● 袁行霈

岁次戊子，许逸民先生以其《徐陵集校笺》示余，且嘱为序。余治古典文学有年，于六朝衣冠之风流倜傥，梁陈文坛之绮密瑰艳，未尝不心向往之。然于孝穆未敢多加评鹭，以其缉裁巧密，不易索解故也。今读许氏校笺，语必溯源，事必数典，凡疑难处必有一校，困惑处必有一笺，余多年之疑问遂涣然冰释矣。

今观孝穆之诗文，非淹通博雅之士莫能为也。以其器局之深远，才学之宏博，固可享盛名于当朝，岂止辞藻斐然、声韵调畅而已。盖文学者，五音繁会，五色杂陈，本不应拘于一格。自然固佳，绮丽亦无妨；冲淡固善，纤秣亦未尝不可。文各有其所用，人各有其所好，未可以一绳墨衡之。若就文学演进而言，倘无南朝之声色，以修饰汉魏之风骨，何来唐代近体诗之大观耶？

徐庾并称，由来已久。然世运有兴废，文名有显晦，至于今日，庾信声名大著，而徐陵半被埋没。逸民先生有感于此，乃发愿校笺徐集，焚膏继晷，孜孜不倦，终成此巨制。细览之余，感佩良多；推敲再三，愈觉可贵。后之治南朝文学者，倘不复冷落孝穆，则亦不辜负逸民先生之苦心矣。

逸民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长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多年，既长于古籍整理，又精研古典文学，余一向视为畏友。今命余为其新著作序，不敢推诿，聊书数语，以表敬意，并见吾侪于学问之追求也。

（《徐陵集校笺》，徐陵著，许逸民校笺，全四册，
中华书局 2008 年 8 月，148 元）

“秦汉史论著系列”四种自序^{*}

● 邢义田

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是我长久关注的主要课题。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色。

学者讨论秦汉帝制的形成，每每从春秋战国这“天地间一大变局”的角度出发，强调从周代封建制没落到秦汉郡县官僚制出现，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变。这几百年间确实有极大的变化。然而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以春秋战国至秦汉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聚落来说，在定居式农业、族人聚居、聚葬和职业世代相袭的基本生活形态上都没有太大变化，表现出顽强的延续性。聚落内部尊老尚齿的伦理，历经春秋战国的巨变也延续不绝。这是两千年传统中国农村一层重要的底色。春秋战国以来，列国以乡里仕伍之制将乡野聚落编组起来，加强控制。这大体上并没有破坏聚落的结构，甚至强化了原有的秩序和权力支配关系。此后，象征国家征兵、征税和司法的有秩、嗇夫、里正和代表乡里聚落本身利益的父老，共同成为基层聚落的领袖。这本集子中的《汉代的父老、憚与聚族里居——“汉侍里父老憚买田约束石券”读记》、《汉侍廷里父老憚买田约束石券再议》、

* 中华书局即出。

《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和《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四篇都和探讨这个主题有关。

这样的社会又会产生出怎样的统治体制和相应的价值观？过去二十多年的探讨主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注意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因此写了《从安土重迁看汉代的徙民和迁徙刑》，指出不论就农民本身或统治者的角度，都不会也不希望农民轻易离开土地。汉代政府为了实边或救荒，迁移人口每每需要提出鼓励措施，而迁徙刑造成迁者离乡背井，不得返葬，也往往会被认为是“更甚于死”的重刑。由于想到农民不轻易也不可能年年离开乡里，因而写成《汉代案比在县或在乡？》一文，分析农民日常可能活动的范围、旅行的条件、地方行政的能力以及汉代县、乡面积等等因素，指出汉代每年八月案比，只可能在乡里，而不可能在县城举行。

另外利用汉代居延和敦煌边塞出土的大量习字简、急就篇和九九术残简等，写《汉代边塞士卒的军中教育》和《汉代〈苍颉〉、〈急就〉、八体和“史书”问题——再论秦汉官吏如何学习文字》两文，指出由内郡各地征调到边塞守边的士卒，原本不通文墨，即所谓“不知尺籍伍符”，在服役期间有机会学习文字、算术和国家法令，退伍后返回乡里，即成为地方官员以外，较底层的知识文化群体，也成为帝国重要的一部分支柱。

《月令和西汉政治》是依据秦代武公时期更修《为田律》木牍、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墓出土简牍和敦煌悬泉出土王莽月令诏条五十条，配合传世文献写成。本文指出月令早已存在，系统多样，汉以后逐渐统一，但汉朝自有“汉家月令”和经书月令不完全一致。王莽即使尊经泥古，也只能摘其可行者行之。王莽月令诏条清楚反映传统政治不能违背，而且只能顺应一个定居农业社会的生活秩序。这样的原则自《夏小正》出现以来大概就不曾改变过。

《从尹湾出土简牍看汉代的“种树”与“养老”》一文则指出秦汉

政府如何积极维护一个自古以来乡里“尚齿”的传统。《秦或西汉初和奸案中所见的亲属伦理关系——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秦简书〉简 180—196 考论》一文从秦或汉初的一件和奸案辩论案例，指出以秦地风俗为背景的秦律有着和关东六国伦理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汉代的意义。以五服制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礼制虽经汉代循吏大力提倡，真正变成国家法律遵循的原则，并在中国社会生根，要等到晋代泰始律出现以后。因为服制成为法制的原则，借法律的力量强制推行，中国社会的儒家化才从晋代以后向前大步迈进。

二是注意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前后写了《东汉孝廉的身份背景》、《察举孝廉的年龄限制》、《论汉代的以貌举人》和《秦汉的律令学》等文，探讨不同背景的地方精英，以什么条件，通过怎样的管道进入全国性的官僚体系。秦汉官僚大体上都是在以吏为师的传统下，接受以律令为主的文吏训练；如要升迁，就须进一步通晓儒经。汉代经师无论公私，几乎都是在朝或退隐的官员，拜他们为师可以说也是以吏为师。章学诚早已指出，以吏为师是政教不分的封建老传统，秦汉承之，足证秦汉去古之未远。汉末王粲曾指出“吏服雅驯，儒通文法”是汉代官员质量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到汉末魏晋才随着士族的贵族化，官分清浊而渐渐消褪。

三是注意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一文从汉代“如故事”和“便宜从事”这两个公文套语，探讨汉代官僚运作的基本依据和特质，指出祖宗故事、经义和律令是官僚行政的三大依据。官僚行政有因循保守的倾向，又因允许某种程度的便宜行事，而能保持弹性，不致僵化。为求了解秦汉行政的特色，曾注意秦汉地方公文书的形成方式、行文程序和保存。因此写了《从简牍看汉代的行政文书范本——“式”》、《汉代书佐、文书用语“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候粟君责寇恩事”简册档案的构成》、《湖南龙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等论文。

谈官僚体制运作不能不说官僚顶端，权力来源的皇帝以及皇帝制背后的思想观念。这一部分尚未完成，目前仅写了《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秦汉皇帝与圣人》、《汉武帝在马邑之役中的角色》、《母权、外戚、儒生——王莽篡汉的几点解释》、《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等文。

四是注意官僚士人的价值观。过去有学者指出从战国以后，封建时代的武士蜕化为文士，汉代儒家兴起，变得重文轻武，或者说没有了“兵的文化”。但我认为封建时代的某些价值观，如《诗经》里所说的“允文允武”，并没有随郡县官僚制的建立而烟消云散。《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种典型》一文从魏晋南北朝士人对当代及汉代的评论、两汉官吏的养成教育、仕宦过程、仕宦中的实际经历、文官武吏都佩刀带剑的服饰特色、墓葬画像和碑志赞颂的内容，指出秦汉官吏虽分文武，实则分际不严。一般官吏习骑射、知兵法，出入文武两途。两汉荐书每以“才兼文武”为言，汉末墓葬祠堂画像充满狩猎和战争图，墓碑经常以文武双全表扬死者。这些都反映出封建贵族的基本价值，一直到汉末没有大的变化。

以上相关的论文共数十篇，分别辑入第一、二册。为了研究以上课题，过去二十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数据。因为简牍文书可以说是秦汉官僚行政最直接的物证，而大量的墓葬画像石砖和壁画则生动反映了地方官僚的集体心态和价值观。学习过程中写了相关论文数十篇，分别辑入第三、四册。

第三册以简帛研究为主。自19世纪末汉晋简牍大量出土，简帛出土和研究经历一百多年，已于近年蔚为显学。我真正开始接触这个领域是在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后。史语所收藏有19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和相关的档案，又有劳幹和陈槃等著名先驱。身为后辈，自然从学习史语所的材料和前辈的著作入手。

这一册分成“研究”和“述旧与资料”两部分。第一部分大半和居延汉简有关，兼及新出土的简牍。这部分除了步武前辈，作简牍

文书内容的考证,也试图探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

我进入这个领域是从整理史语所所藏居延汉简入手。早年限于环境,所中前辈几乎无法利用堆栈在库房里的原简。1986年,史语所文物陈列馆完工,考古文物移入新楼仓库,原藏于皮箱中的汉简才得以摊开,供研究人员方便地调阅。那时鸠集了所中同好,展开以红外线阅读原简和重校释文的工作。一晃十余年。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前辈工作的艰辛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少许的成果如《汉简、汉印和〈急就篇〉人名互证》、《居延出土的汉代刻辞箭杆》等等都是这个过程里的产品。1994年《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出版,自然吸引我和同好继而研读新简。基于此,又写了一些札记。其后江苏连云港尹湾、湖北江陵张家山和陕西长安未央宫简等等先后刊布,也都就一愚之见,写了些不成片断的小文。

简牍出土日多,相关研究蔚为显学。一些研究上的偏失逐渐暴露出来。大家太过关注简牍的文字和文字反映的问题,太过忽略简牍是在怎样的形式和环境被使用的。因此,我转而注意简牍的重量、体积和书写姿势、家具、编联和保存等等使用方式的关系,写成《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一文,希望引起大家对“简牍文书学”一些基本问题的注意。

又因我曾接触罗马帝国的木牍文书和研究,觉悟到应将出土文书放置到出土当时的环境中去了解。过去对居延和敦煌等简牍遗址的调查和研究,相对于简牍文字本身,要贫乏得多,许多简牍文书确切地出土位置、层位和环境,至今一片混沌。遗简上提到的烽隧名和地名,至今仍不能和遗址确切地对应出来。这些都是边塞简牍研究的致命伤。2006年夏走访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甘肃和内蒙古额济纳河一带,并利用卫星定位仪记录了若干遗址的位置,因此写成《全球定位系统(GPS)、3D卫星影像导览系统(Google Earth)与古代边塞遗址研究》一文。此文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

是指出问题,希望新的工具能为今后的简牍和遗址研究带来新的角度和思考。

述旧和资料这一部分主要是依据档案和口述,为前辈研究和保存居延汉简等文物的功劳和过程作一记录。感念前辈之筚路蓝缕,我先后写下《劳幹院士访问记》、《劳幹先生的汉简因缘》、《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夏鼐发现敦煌汉简和晋泰始石刻的经过》四文。这一部分也收录了史语所同仁萧璠、林素清、刘增贵、颜世铉和我一起整理居延汉简的成果和工作报告。没有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不会有《居延汉简补编》的出版,也不会有居延汉简数据库的建立。在此要特别感谢工作伙伴们。这一部分较特别的一篇是去年11月到香港大学,得见冯平山图书馆所藏,和居延汉简相关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档案以及马衡、劳幹、向达、余逊四人的释文底稿和释文签数千件。回台后将所见写成一篇调查记,希望为近代简帛学术史提供一项还少人知道的材料。

第四册以收录有关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的研究和评论为主。图像研究是正宗秦汉史学家不屑一顾的领域。长期以来大概只有艺术家,少数的考古或美术史学者垂青。我尝试去学习,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在秦汉史研究的领域里,研究政治、社会、思想、制度、经济史的学者和研究图像、画像或艺术史的,基本上极少交集。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情况。我深深相信“画为心声”就如同“文为心声”。古人留下文字或图画,是以不同的形式和语言在传达所思、所感,其信息之丰富多彩,并无不同;其易解与难明,各有优劣,难分轩輊。后人要了解古代的人、事或社会文化,不能图、文兼用,仅凭“只”眼,不论闭上哪一只眼,都将无法“立体”呈现那个时代。

这些年,陆续读了不少和汉代画像有关的中外论著。他们的解读和论证不免有些捉风捕影,因而逐渐明白为何正宗的秦汉史学者不轻易使用图像材料,也难以接受图像学者提出的解释。我不曾受过艺术史和考古学训练。如何利用古代存留下来各式各样

的图像或视觉性材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二十年来,不得不面对自己训练的不足,试图找出一套令自己心安,也足以说服他人的图像解读方法。

近二十年前,刚接触汉代画像时,完全不懂方法。当时受到姚师从吾“学骑马,骑到马背上;学游泳,跳到河里去”名言的影响,一直觉得方法无待外求,就在具体的材料之中。因此没有求助汗牛充栋的中外艺术或图像学理论,而是一头跳进画像的大河。在接触材料和面对问题的过程里,靠着直觉,摸着石头,一点一滴分析归纳,逐渐琢磨出过河的方法。

首先察觉到画像表现存在着一定的套数。1990年写《东汉孔子见老子画像的构成及其在社会、思想史上的意义》,第一次提到格套,并试着依据格套和榜题,从众多的母题中,找出所谓的孔子见老子画像。这一篇习作迄今没有发表。不过后来证明格套还算有用。它像秦汉时代的谚语一样,是了解汉代社会通俗智慧和心态的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窥汉画寓意的门径。

整整十年后,写成《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此文较为细致地讨论了格套和榜题,将构成汉代画像单元的组件,区分出必要、次要和非必要的部分,又讨论了格套运用的灵活性、寓意的多重性和墓葬与祠堂画像的拼凑性。重要的是同时警觉到这一套方法的有限性。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尝试处理牵涉更广的题材。同一年(2000),发表《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数据中的“胡人”外貌》一文。这一尝试使我觉悟到格套在艺术呈现上所可能造成的图像与事实,图像与文献之间的差距,以及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

2002年发表《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在方法上,有较新的进展。第一,这篇小文再一次检讨了格套和榜题的关系,分析榜题的作用,并为榜题类型作了初步分类。其次,从画像的“空间”和“时间”因素,讨论了汉代艺匠的创作空间。第三,指出画工石匠传统和文字

传统之间可以有重合，也可以有不同；它们分享着共同的文化资产，却可以有不同的表述。

“多重寓意”和“脉络意义”之说则是在 2005 年《汉代画像胡汉战争图的构成、类型与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的。这是《胡人外貌》一文的姊妹篇。这一篇遇到解释上最大的难题是：在一无榜题可据的情形下，如何理解胡汉战争画像中出现的风伯、雨师、雷公、河伯、泰山君、大禹等一类的人物？因而提出寻找“脉络意义”的辅助方法。本文试图论证所谓的胡汉战争图应有较早期，意义也较单纯的渊源。可是在几百年变化的过程里，它承载了愈来愈多的想象和期望，蕴含了愈来愈复杂或多重的寓意。它们之间不必然谐和统一。面对古人思想和艺术呈现之间的复杂性和不统一，我们最好从动态的角度去考虑，不宜强加调和，仅给“一套”解释。

《捞鼎图》和《汉代石刻画像和陶、铜、木制品中的猴与马母题》是 2007、2008 年所写的两篇。这两篇希望另辟蹊径，去解读一些用先前使用的方法无法解读的汉画母题。《捞鼎图》主要指出西汉中晚期出现在石棺上的捞鼎图并不是照抄《史记》讽刺秦始皇的泗水捞鼎故事。它借用既有的故事，却从一开始就糅杂了其它种种求仙的传说，有了主角、内容和意义上很大的转变，以适合墓葬文化和升仙心理的需要。它所传达的重点和司马迁所说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在汉画捞鼎图中从不见“秦王”和“泗水”榜题，观看捞鼎的人从语意暧昧的“大王”变成墓主，更增添了《史记》不曾提到的龙等构成元素。

《汉代石刻画像和陶、铜、木制品中的猴与马母题》一文是从草原地带出土的一种猴骑马小型铜垂饰说起，试图说明利用某些出现在后代的母题，可以回推出汉或汉以前类似母题的意义。和马上封侯以及猴防马病寓意相关的图饰不但出现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中，也出现在其他材质的器物上，此后绵延上千年。艺术母题的延续是传统社会文化延续特质的一环。

总体来看，以上这些解读和观察根据的方法都有局限，仍然无

法解开许多解不开的谜团；即使自以为解开的，也有待今后证据的考验。不论如何，希望今后能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综合图像和文献，重新勾勒孔子、老子和周公的形象以及他们在汉代皇帝制下具有的时代意义。

过去二三十年，也曾有意打破历史学界存在的某些界限：一是专业领域的界限，一是使用材料的界限，一是中外历史的界限。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等断代史，或政治、制度、经济、史学、思想、文化、美术等专史，又有所谓的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古器物学等等；随之而有无数各式的专业组织和期刊。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两大营垒。这些都是随着近代学术趋于专业分工，逐渐形成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初形成都有理由，其结果是造成研究上“囿于一隅”的严重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

因为对此深感不安，我试图打破界限，一直不愿以那种史或那种材料的专业研究者自居。在学习摸索的过程里，随着面对的课题，顺手运用材料，不论图、文，不论传世或出土，也不论中外。这套集子依性质和主题分为四册，实际上边界模糊，甚至有诸如《从比较观点谈秦汉和罗马皇帝》、《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军队的特色》、《罗马帝国的居延与敦煌》、《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赫拉克利斯在东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亚、印度与中国造型艺术中的流播与变形》、《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木牋试释》等等捞过界的浅陋之作。

捞得过界，避不开浅陋。浅陋之作，岂值汇集？两年前，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岩兄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丰兄提议结集出版，以利读者。二兄与我论学多年，热心代为联络。这时，社科院历史所的侯旭东兄引介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名著极多。学生时代以来，不知读了多少。中华书局的徐俊和于涛先生先后出面邀约，深感荣幸，欣然应允。衷心感谢诸好友和中华书局的盛意。

应允之后，在一年多的修订过程里，才觉悟不该答应。旧稿先后成于二十余年间，多半不是小订小补可以了事，大修大补又心余力蹙。最后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减少错误而已。许多时贤高论不及补入，深觉不安。又有些旧文，蒙时贤商榷，或修或删，也有些存旧，以便读者对照。学棣刘晓芸、刘欣宁和游逸飞帮忙阅读书稿，找出不少错。若不是他们，错误肯定更多。谢谢他们。

接着，还要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个优良的环境里，有无数使我得益的师友，图书馆、考古库房、事务室和秘书室等单位也有无数默默支持我的同仁。二十余年朝夕于斯，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在这段时光里，除了良师益友时刻扶持，我有机会摸遍史语所收藏的居延汉简、汉晋碑拓和画像拓本，说我是吃史语所的奶水长大，一点不为过。这个集子理所当然，献给母亲——史语所。

最后，出版这个集子适值家父九十大寿。父亲早年读书于南开中学，不及卒业而中日战起。从此闯南走北，戎马一生，常以无暇，也无书可读为憾。他老人家退休后，二十余年来，发愤苦读，读书每至夜分，批注、笔记盈于篋笥。长于安逸的我，深愧不如，后半生当以父亲的用功为榜样。在此祝福他老人家福寿康泰，并以这个集子权充寿礼。

2008年8月8日

邢义田“秦汉史论著系列”四种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

《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

《地不爱宝——汉代简牍》

《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

《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译本 自序^{*}

●〔日〕渡边信一郎

—

恰好是在十年前的1997年1月至10月初，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特定国派遣研究员，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行了九个月的研究。这是缘于在日本也非常知名的经君建先生的欣然接纳，目的是进行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但对于我来说也怀着另外的愿望，就是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际身处中国之中，亲眼观察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发生巨变的中国，弄清此前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中应该反省的地方，或者此前的研究方针有无变更的必要。

社会科学院分配的宿舍在靠近西单的民族饭店的一个房间。所以除了8月在华北各地旅行之外，我基本都在西单周边活动。曾在2月24日早晨目送了经过长安街的邓小平氏的送葬车队，也曾亲眼目睹7月1日傍晚香港回归之际西单沸腾的人群和烟花不绝的夜景。

在北京，我将仔细阅读自日本带来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作为每日功课，并以札记形式记下心得。虽然不像鲁迅先生那样频繁，也每两周一次乘坐15路公交车去琉璃厂购买旧书、线装书和新书。当时也不曾察觉时光飞逝，就把买的书一本接一本地读完了，今天想起来，真是无上的幸福。周末则流连于民族饭店附近的李

* 《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即出。